

中国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

顾朝林

赵晓斌

中国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国家计划委员会

(香港浸会学院地理系 香港 九龙)

摘 要 本文通过资本流动对中国区域开发的作用研究,概括了中国传统区域发模式——“内陆均富”和“沿海先富”及其存在问题,运用西方现代区域发展理论构造了一个以城市为主体的新型区域开发模式。

关键词 中国 区域开发 模式

分 类 (中图法) F123.7 (科图法) 57.171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自然、人文和经济地域差异明显的国家。长期以来,区域研究一直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主题。地理学者注重从资源分布分析区域差异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1-7];政治经济学者则从意识形态、政治和政策角度分析贫穷和富裕地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寻求区域的均衡^[8-12];经济学者则从价格、财政等角度分析地区间的不平衡贸易和财政杠杆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13-15]。但从整体看,这些研究均缺乏从理论的深度解释中国的空间经济现象。本文试图通过资本的分配和流动,研究中国传统区域开发模式及其存在问题,运用西方现代区域发展理论构造一个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发展模式。

1 中国区域开发中的资本流动机制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分配制度是构成国家区域发展的基石。与此相对应,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也逐步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

1.1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在中国区域发展过程中,一切经济活动,尤其是发展活动,首先要列入计划后才进行财政预算,待资金到位后才付诸实施。这个过程从微观来讲称“立项”,从宏观来讲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即主管部门(如化工部)提出设想和可行性报告,然后由经济的综合部门(计划委员会)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项目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财政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平衡,最

后确立各类项目组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主体。

1.2 税收制度

税收是国家预算的经济基础，也是区域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的税收制度由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历了由复合税制简并为单一税制，再由单一税制变革为复合税制的过程。

1978 年以来，为了彻底改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国家对国营企业通过改企业上交利润为征收所得税（简称利改税）来解决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1984 年又进一步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划分为 11 个税种，由“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至此，通过两步利改税及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初步完成了由单一税制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其它各税相配合的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的转化。

1.3 财政预算制度

建国 40 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单式预算制，即把每一年度的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汇集编列在一个统一的预算表中。由于没有区分各项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吃饭的钱”同“建设的钱”都捆在一起使用，因而不利于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效益分析，不利于看清赤字产生的真正原因，也不利于增强财政分配的透明度。最近已将这种单式预算制改为复式预算制，即将预算收支按来源和使用的不同性质，分别编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收支预算表中，共同构成国家总预算。中国复式预算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个部分。建设性费用不足就不能随意扩大经济建设规模，同时也不能把发国库券或向国外举债的债务收入用于经常性费用开支。这种制度能够制约经常性开支增长，促使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做到量力而行。

1.4 财政分配制度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分配制度经历了三次主要变化。它们是：（1）统收统支制（1950—1979）。其主要内容有^[16]：①国家财政管理权限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②各种主要税收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都要统一上交中央金库。③一切财政开支统一由中央财政拨付。④建立统一的预决算，审计会计制度和严格的财政监察制度。一切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无预算不拨款。这种制度运用收支分离、直上直下方式使国家大量的资金处于不停的上缴下拨过程中，实际上难以操作。1951 年增加了“分级管理”措施，即将国家财政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然后将原来直上直下方式改为先就地平衡再上缴下拨。这种在行政区和省（市）区的就地平衡称为地方财政，中央平衡称中央财政。这种制度虽在其后的 1958 年、1961 年、1977—78 年均有所改动，但统收统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16]。（2）地方财政包干制（1980—1993）。1980 年，中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分配体制，在财政收入方面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收入，财政支出则分为按企业划分的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并依据划分后的收支范围实行分级包干，五年不变^[17]，正式确定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其后国家于 1985 年按照两步利改税制的构想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又于 1988 年为稳定财政收入实行“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以“承包”为特点的财政分配制度。财政包干制虽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同时也刺激了地方追求局部利益的冲动，出现片面追求本地利益，搞“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和地区经济封锁等不良倾向，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跨越税收管理权限，擅自决定对一些产品和企业减税或不征税。据统计，在 1985—1989 年间，税种虽然不断增加，但同期

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由 29% 下降到 21%，从而导致中央财政赤字的逐年扩大。(3) 分税制（1994 年—）。为了解决上述矛盾，1994 年国家实行财政体制改革，把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及其管理权限的分税制。其具体内容是：按税种划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核定支出基数，合理确定地方上解数额和中央返还数额。分税制把与产值、速度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这不仅可以较好地兼顾中央、地方两方面的利益，而且可以弱化地方盲目发展和实施地方保护政策，有利于企业平等竞争，分税制同时也把企业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的所得税划归地方，这将进一步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培育财源、当家理财的积极性。

近年来，中国区域开发的资本流动机制除了计划、税收、财政外，信贷、证券和外资的作用也愈益明显。概括我国区域开发中资本的流动机制，它们与企业、个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区域开发项目之间具有如下关系（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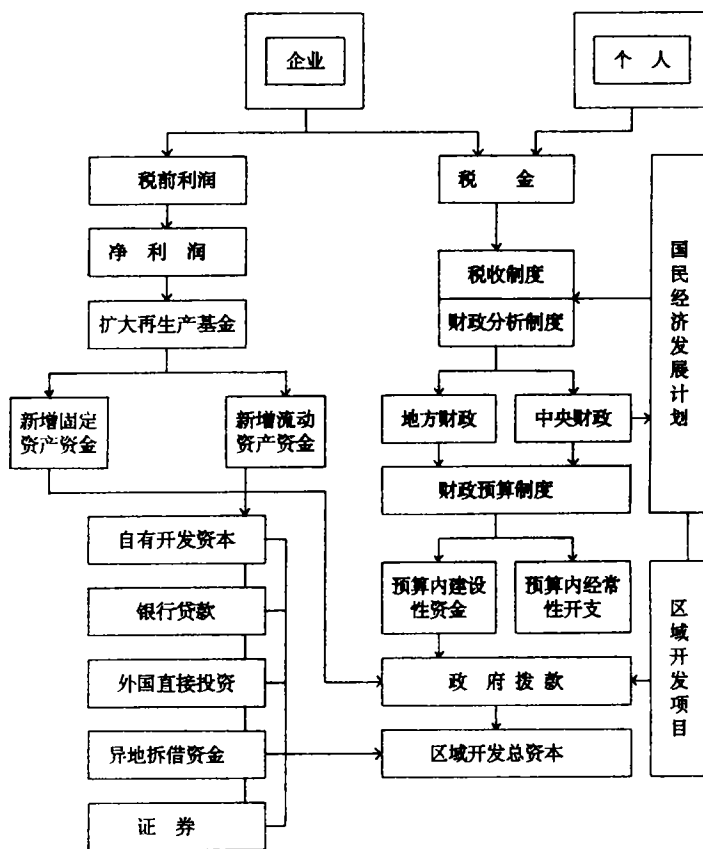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开发中资本与计划关系简图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planning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2 中国传统区域发展模式回顾

中国区域开发资本流动方式对区域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建国初，中国的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1949 年沿海 11 省（区）市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比重达 71.7%，尤其集中在上海、江苏和辽宁三省市。而在广大的内陆中西部地带，仅重庆、武汉和太原等城市有些现代工业，新疆、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几乎没有工业^[19]。建国以来，中国区域开发通过资本要素的流动方式变化采取了两种明显的区域发展模式。

2.1 内陆均富发展模式

在 1949—1978 年的 30 年内，国家在“自力更生”，“希望有外援，但不能依靠它”的精神指导下，外国资本基本没有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区域开发资本主要来自于在“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与分配制度下的政府拨款。中央政府实施重视内陆欠发达区域的“均富”发展模式。据资料统计，1952—75 年期间，国家资金投资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尤其“三线”地区最为集中，而沿海地区投资相对比例偏少（表 1）。

表 1 中国国家资金投资分布（1952—1975）
Tab. 1 China's national capital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时 期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其中“三线”地区	
	(a)	(b)	(a)	(b)	(a)	(b)
“一五”计划（1953—1957）	41.8	46.65	47.8	53.35	30.6	30.6
“二五”计划（1958—1962）	42.3	44.13	53.9	55.87	36.9	36.9
调整时期（1963—1965）	39.4	不详	58.0	不详	38.2	38.2
“三五”计划（1966—1970）	30.9	31.51	66.8	68.49	52.7	52.7
“四五”计划（1971—1975）	39.4	42.53	53.3	57.47	41.1	41.0
整体分布（1952—1975）	40.0	—	55.0	—	40.0	—

说明（1）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 12 个省（区）市，其余为内陆地区。“三线”地区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湖北、湖南和山西等 10 省（区）。

（2）（a）陆大道（1988）第 18 页^[19]；（b）Jao 和 LEUNG（1986）第 3 页^[18]。

“一五”时期，由于内陆地区投资总额超过沿海地区，中国区域开发重点开始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二五”时期，国家经济政策偏向自给自足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性区域经济建设。五年中，基本建设投资超过“一五”期间一倍半的有河南、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内陆省（区）份。“三五”、“四五”时期，由于国际形势中美、中苏关系紧张，国家投资重点进一步转移到更加深入内地的“大三线”地区：贵州、四川、陕西、鄂西、湘西等。即使在沿海地区的省（区）市也依据建立战略后方的思想，在位于各省（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生活生产条件相当差的山区建设自己的“小三线”，如山东的莱芜地区，福建的南平—三明—漳州一线，上海在安徽的皖西南地区，辽宁省的辽西山地，河北

省的太行山北部山地等等，最后就连缺煤的江苏省也投巨资在江南丘陵地区开采“鸡窝”煤。

“内陆均富”区域开发模式极大地忽视了经济效益，甚至成本效益也不顾，最终毁多于誉。据统计，1949—79 年间内陆地区因 30 年的大量投资，其工业产值达到了沿海地区的三分之二，但其利税却不及上海市的一半。而同期内陆及沿海地区的人均产值差距却由 1：1.5 扩大到 1：1.9，沿海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 12.7%。

2.2 “沿海先富”开发模式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点，并允许部分地区和人民先富起来，区域开发资金由原来的依赖政府拨款为主转变为政府拨款、地方自筹、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证券等多渠道筹措，东部沿海地带因投资环境优越、回报率和经济效益高重新成为中国区域开发的重点地区。

自 1979 年以来，中央政府以放权让利作为改革主线，试图通过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促进提高经济效益。(1) 企业减税让利。自 1979 年开始实行利润留成，随后实行两步利改税和经营承包制，使得上交利润递增率基本上在 7% 以下，远低于生产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以致在全国企业利润额增加的同时，上交利润比率却不断下降。(2) 地方政府财政包干。1980 年中央政府实行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1985 年按照两步利改税的构想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1988 年为稳定财政收入又实行递增包干制，使得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1981—1993 年连续 12 年出现财政赤字，而预算外资金却不断膨胀(表 2)。总之，上述两项改革措施使原来以中央财政为主的调控手段削弱，壮大了地方政府的财力。此外，地方政府对企业预算外资金也有所控制，一方面用减税的方法减少分成总额，另

表 2 财政结余与预算外资金收入

Tab. 2 Central and local revenue in China (1979—1992) 单位：亿元

年 份	财政结余			预算外收入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总计	数量	占预算内收入%
1979				452.9	42.4
1980				557.4	53.7
1981	—11.87	—13.64	—25.51	601.1	59.4
1982	—42.28	16.94	—29.34	802.7	79.0
1983	—83.96	40.5	—43.46	967.7	82.7
1984	—30.0	—14.51	—44.54	1 188.5	82.4
1985	0.83	20.79	21.62	1 530	86.1
1986	—94.18	23.63	—70.55	1 737.3	81.9
1987	—96.78	17.19	—79.59	2 028.8	92.1
1988	—106.57	27.96	—78.55	2 270	97.5
1989	0.3	—92.6	—92.3	2 658	100.0
1990	—4.9	—134.7	—139.6	2 708.7	92.0
1991	—118.0	—84.6	—202.7	3 243.2	103.0
1992	—168.7	—67.9	—236.6	3 854.92	97.7
1993	—260.5	61.3	—199.2	—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3。

一方面则用摊派方式将分散的资金重新集中起来，有的甚至通过控制基本上是软约束的基层银行信贷资金来筹措资金。因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成为筹措区域开发资本的主要组织者。

80 年代以来，外国资本流向沿海地区。据统计，1979—1993 年以来我国实际吸收外资 1 094.9 亿美元，分省区总计 807.5 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 718.6 亿美元，占

表 3 中国历年引进外资分省区统计表（1979—1993）

单位：万美元

Tab. 3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1979—1993）

（10thousand US\$）

省 区	1979—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合计
北 京	141 669	47 704	39 202	29 960	36 159	81 731	376 425
上 海	252 362	46 649	32 104	33 025	89 929	31 7803	771 872
天 津	84 772	16 776	9 856	26 089	26 259	62 368	226 120
河 北	6 040	9 291	9 780	9 628	11 309	39 654	85 702
辽 宁	127 187	38 814	72 739	64 518	68 012	139 693	510 963
山 东	44 002	20 833	23 045	37 308	102 685	188 267	416 140
江 苏	75 474	16 116	24 769	31 471	146 324	284 371	578 525
浙 江	46 267	12 546	12 777	14 381	27 664	103 175	216 810
广 东	813 334	239 027	201 541	258 375	474 641	984 313	2 971 231
福 建	94 749	58 792	42 684	57 049	146 561	290 599	690 434
海 南	—	9 497	11 698	21 244	51 480	74 832	168 751
广 西	39 987	8 271	6 260	8 654	19 881	89 756	172 809
安 徽	23 006	2 641	4 228	2 512	5 466	25 764	63 617
湖 北	35 524	6 543	9 391	14 114	21 057	55 467	142 096
黑龙江	23 610	7 677	4 695	2 953	7 269	23 232	69 436
江 西	9 621	2 204	3 587	5 065	12 179	22 817	55 473
吉 林	12 330.1	1 496	3 085	5 449	7 534	27 527	574 421.1
山 西	—	981	777	3076	5 384	8 643	18 861
内蒙古	—	445	1 064	242	828	8 526	11 105
湖 南	10 650	13 041	14 029	10 274	13 521	61 716	123 231
河 南	16 439	5 949	3 412	7 544	5 316	30 491	69 151
四 川	42 264	25 515	6 318	15 439	11 214	57 141	157 891
贵 州	3 401	1 389	1 110	1 634	1 979	4 294	13 807
云 南	2 743	1 007	1 216	2 137	2 875	9 702	19 680
青 海	—	—	—	—	68	324	392
甘 肃	—	111	124	478	35	1 195	1 943
陕 西	31 638	10 495	7 364	3 574	4 553	23 430	81 054
宁 夏	—	—	25	303	352	1 190	1 870
新 疆	5 841	1 011	2 498	7 420	5 403	530	27 473
西 藏	1	11	—	—	—	—	12
东部沿海	1 725 843	524 316	486 455	591 702	1 200904	2 656 562	7 185 782
中 部	27 089	40 977	44 268	51 229	78 554	264 183	506 300
西 部	858 871	39 539	18 655	30 985	105 032	102 576	382 675.1
分省区总计	1 838 819.1	604 832	549 378	673916	1 384 491	3 023 321	807 475.1
全国合计	1 942 910.1	1 005 915	1 028 939	1 155 417	1 920 233	3 895 972	10 949 386.1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统计出版社，1990 年；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90，1991，1992，1993，1994，统计出版社。

89.0%，尤其集中在广东、上海、福建、辽宁、北京、江苏、山东、天津等省（市）区（表3）。

由于沿海地区各省（市）区财政收入好于内陆地区，再加上外国直接投资资本注入，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据1980—87年中国投资分布的空间变化分析，不论是中央、地方和外资在东部沿海的投资均从1980年的46%、49%和55%上升到1987年的56%、57%和81%（表4）。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资金已经投向沿海地区。相反，中部及西部地区得到中央、地方和外资的资金比例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表 4 中国投资分布的空间变化（1980—87）
Tab.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investment (1980—87) 单位：%

区 域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外国直接投资		
	1980	1985	1987	1980	1985	1987	1980	1985	1987
东部沿海地区	45.6	50	55.5	18.8	56	56.3	51.7	76	80.9
中部地区	40.7	40	35.5	41.8	35	31.9	23.6	19	12
西部地区	13.7	10	9.2	9.4	9	8.8	21.6	5	7.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报表》1980，1985，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

据1992年资料，东部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53%，人口占全国的41.2%，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已经占全国56.5%左右；80年代全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9.3%，而沿海地区达10.3%；1992年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3%左右，而沿海地区都超过18%，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先富”起来的地区。

“沿海先富”区域开发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沿海地区经济的起飞，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均有明显好转，但空间不平衡却进一步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欠发达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 战后西方区域发展理论

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明显扩大的空间不平衡。针对这一问题，西方理论界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外部功能一体化（External Functional Integration）达到空间的平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以通过内部地域的一体化（Internal Territorial Integration）以及“选择性空间集聚”（Selective Spatial Closure）达到内部自给自足来减少空间上的不平衡。

60年代，罗斯托（Rostow, W. W., 1960）^[20]曾提出广泛用于描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初始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模型。按照罗斯托的模型，全球经济发展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区经济具有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导产业部门，而且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逐步演化的。在50—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高技术的生产活动达到技术的成熟期。由于经济繁荣导致劳动力短缺，它们便开始扩散制造业分厂到经济不发达地区来开拓便宜、稳定且不熟练的劳动力市场。当经济发达地区资本和技术向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时，尽

管在城镇集聚区的中心地区形成制造业为主的主导经济部门并构成经济起飞的条件，但其毗邻的地区仍然处于初级城市化水平阶段，从而使这一地区逐渐分化为经济繁荣的核心地区和毫无优势的外围地区两部分。当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时，必然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1）资源和资本的核心集聚使核心地区经济进一步繁荣，这个过程称为良性循环；（2）而外围地区资本和劳动力的外移导致经济每况愈下，形成恶性循环，并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弗雷德曼（Friedmann, J., 1966）^①将这种经济现象描述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边缘模式。

在 70 年代中期，一方面，西方世界强烈的国际竞争，直接的和社会的工资增长压力以及消费市场饱和等导致生产增长缓慢下降，使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进入长时期的经济衰退中。玛斯（Massey, D., 1976, 1978）接受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区域间不充分发展的根源在于与资本积累相对应的国际劳动分工。她将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在高度自动化现代企业中大量的、低薪、无技术的劳动力；第二部分为在老工业区工作的部分稍有技术的劳动力；第三部分则指少数从事高科技研究与开发的高技术劳动力。按照这一理论，成熟型的大公司开始再一次把标准化的手工生产单元扩散到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仅仅将大公司的管理、财政、研究与开发部门保留在原先的大城市地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赶超发达国家也力图通过适当的资本和技术引进推动经济发展。克那波（Knapp, B., 1986）^②曾经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初的区域经济发展是由与出口相关的城市制造业部门所决定，新型工业引起的技术变革以及贸易增长所得的资本积累推动城市经济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起飞。这种城市经济增长模式被划分四个阶段：（1）初级城市化阶段。城镇仅向其腹地投资促进地方农业区货物贸易，增加资本积累；（2）起飞阶段。城镇通过输入资本引进新制造业部门加工本地资源，待主导工业部门形成后导致经济起飞；（3）第三产业增长阶段。当服务业被现存的制造业吸引时，引起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4）第四产业增长阶段。服务业和行政职能开始取代制造业，并导致经济稳定增长^③。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制造业分厂和市场推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推拉作用”（Push and Pull）下，国际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逐渐形成所谓“转移与分享（Shift and Share）”规律，即劳动密集型生产总是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转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出去。希默（Hymer, S., 1980）运用“新国际劳动分工”术语来描述制造业由传统工业国的核心（Core）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边缘（Global Periphery）”转移的经济现象（图 2）。

每当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一次新的技术变革，国际经济发展就会出现这一次这样的转移，从而也为一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振兴提供一次机遇。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就是及时抓住这一机遇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纵观日本、香港、台

①这里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保险、金融、贸易和房地产称为第三产业，将教育、管理、医疗卫生、游憩和研究等称为第四产业。

湾、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经济发展初级阶段；(2)进口替代阶段；(3)初级出口导向阶段和(4)高级出口导向阶段(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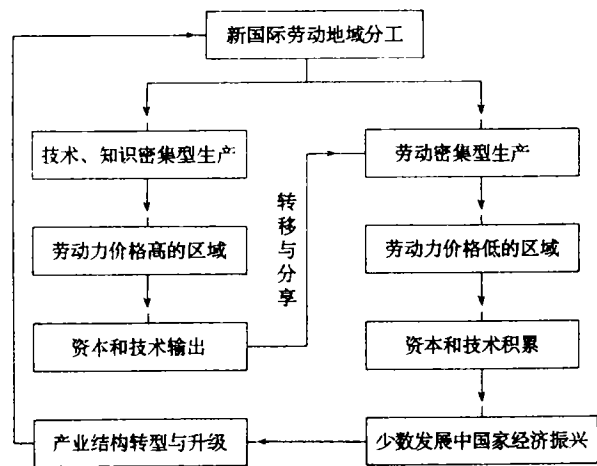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经济发展的“转移”与“分享”
Fig. 2 Shift and shar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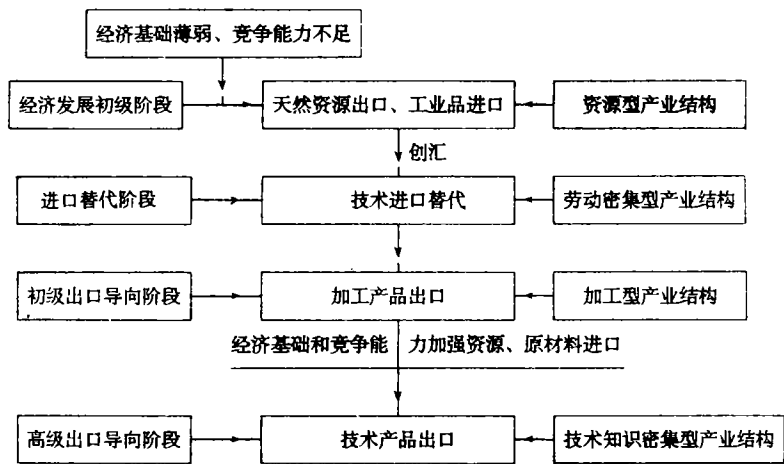


图 3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
Fig. 3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进入 80 年代,弹性生产方式在劳动力、原材料和公司内生产关系等方面更适应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和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发展,跨国公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在全球经济结构重整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再加上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使得运输成本不再构成工业区位优先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成本却成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使得原有的国际性劳动分工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使衰退的西方经济逐渐恢复元气;另一方面,依托发达的通讯技术和网络形成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市场四位一体的企业战略联盟 (Intercompany Strategic Alliances) 正成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其总特征是在不同的国家建立几个技术变革中心,这些中心由复杂的专门网络相互联接起来,形成全球—地方垂直联系的商品生产和全球资本的公司等级体系空间形式,大大促进了产品、市场、技术和经济的国际化。

依据克那波的理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取决于中等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赶超发达国家关键在于为数有限的特大城市的增长,而特大城市自身的增长又依赖于跨国公司、企业战略联盟分支机构、技术变革中心和全球—地方网络的发展。很显然,就中国区域开发模式而言,无论是“内陆均富”还是“沿海先富”,都希望先发展一个地方然后再带动另一个地方,在经济活动国际化、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Global Shift of Industrial Change) 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今天已经失去理论的支持和实证的借鉴意义。

4 中国区域开发的新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1) 均衡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国家的总体规划下,各产业以相同或较为接近的速度平衡增长,最终形成区域性的社会与经济整体的均衡格局。(2) 非均衡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在国家整体规划下,依据本区域的各种特点及优势,以特定的目标和速度有选择地发展符合本地区和整体利益的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争取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成果,加快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很显然,均衡发展模式以内部自求平衡为主要目的,对外依赖性小,可以建立起自己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减少区域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产品、市场和技术国际化的今天,其局限性愈来愈明显。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均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模式。

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货币升值,亚太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开始。由于日本和“四小龙”的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带来一部分市场、资金和技术,促进了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经济、产品、市场和技术日益国际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和发展基础,只有采取非均衡发展模式才是最有效的发展模式。

在制造业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的主导部门前,导致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各地土地的相对生产量。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形成的东富西贫地域差异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然而,由于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沿海转移,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已处于制造业发展的时期,城市

与区域经济能获得持续稳定快速的生长;而广大内地和农村地区仍然维持原有的增长速度,这样势必会进一步加剧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贫富差距。

中国在经济、市场、技术国际化,西方世界跨国公司、企业战略联盟形成全球—地方垂直体系,沿海地区城市集聚区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缩小正在扩大的沿海与内地差距?如何引导中国区域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运行?

我们设想中国区域开发的新模式设计应基于如下两条基本思路:第一,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不断向内地推进,建立公司总部—地方分部垂直体系;扩大沿海与内地的交流和联系,缩小因沿海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全国时空上的差距;同时注重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达到相对差距的逐渐缩小。第二,在已形成中心城市地区采用核心—边缘结构发展模式,通过沿海城市集聚区域中心城市的滴流和传播作用,使经济核心区不断向外推移;并在核心区外围不断地有计划地建设副中心,使核心地区极化作用减弱,外围地区滴流作用增强,彻底缓解外围区因中心区发展呈现的经济连续衰退现象。

空间经济以城市经济为主体,其发展过程由绝对封闭型经济逐步走向相对封闭型经济,再走向相对开放型经济,最后发展为开放型经济区域系统(图4)。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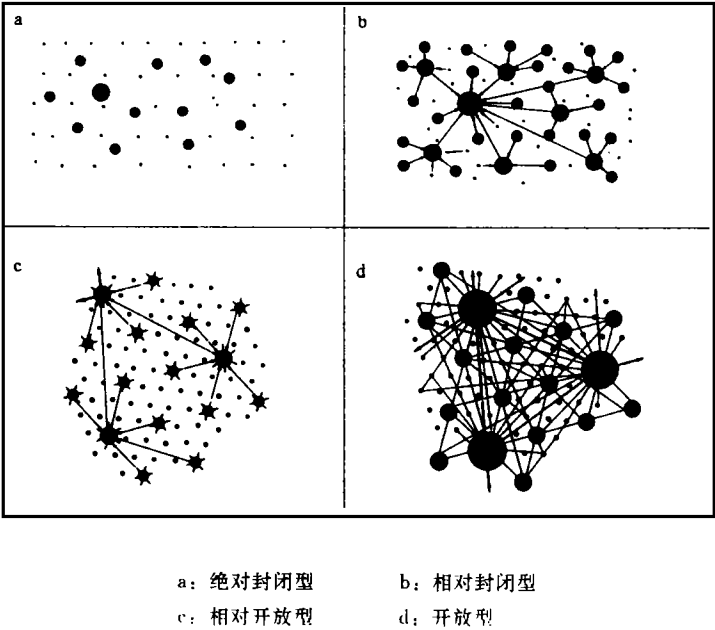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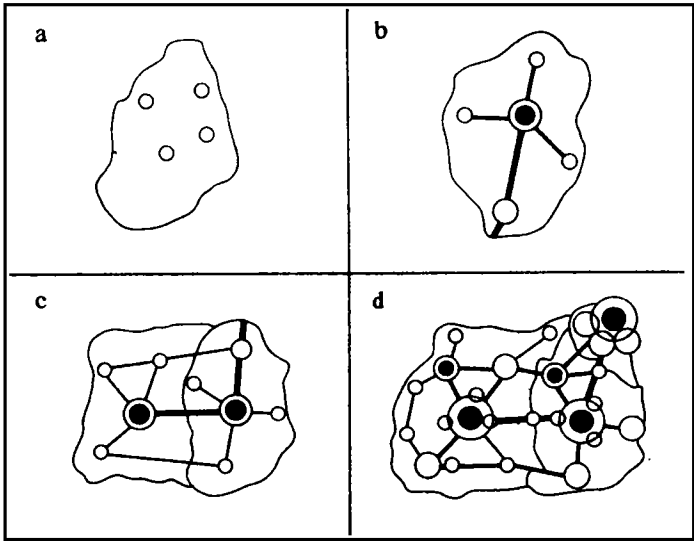


图4 空间经济类型转变过程

Fig. 4 Change of spatial economic patterns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组织：(1) 孤立体系阶段。这一阶段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为均衡态结构，地方中心比较独立，未形成城市等级体系，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形成平衡的静止状态；(2) 区域体系阶段。这一阶段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由于区域开发初期资本相对缺乏，只能选择少数拥有较多自然资源或人口稠密、市场广阔或交通便利，接近国外市场的城市作为开发重点，因此相继出现中心城市。外围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移向中心城市并在其周围发展新开发地区；(3) 区际体系阶段。当外围地区开发趋向成熟时，形成相应的副中心或次级核心；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时，副中心加强逐渐形成多核心结构，并最终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核心—边缘区；(4) 大区体系阶段。当一个地区的极化和滴流作用均衡时，全区经济、社会系统融为一体，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区域最具增长潜力，从而形成功能型相互依存性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这类城市体系进一步演化为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乃至世界都市带（Ecumenpolis）（图 5）。



a：孤立体系 b：区域体系
c：区际体系 d：大区体系

图 5 区域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化过程
Fig. 5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regional urban system

鉴于中国沿海与国外发达国家既存在技术水平，也存在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差距，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立足未稳，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蚕食。因此，要实施上述区域发展新模式时，国内产品国外市场扩大，鼓励出口不仅意味着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创汇增加资本供应，促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区域经济系统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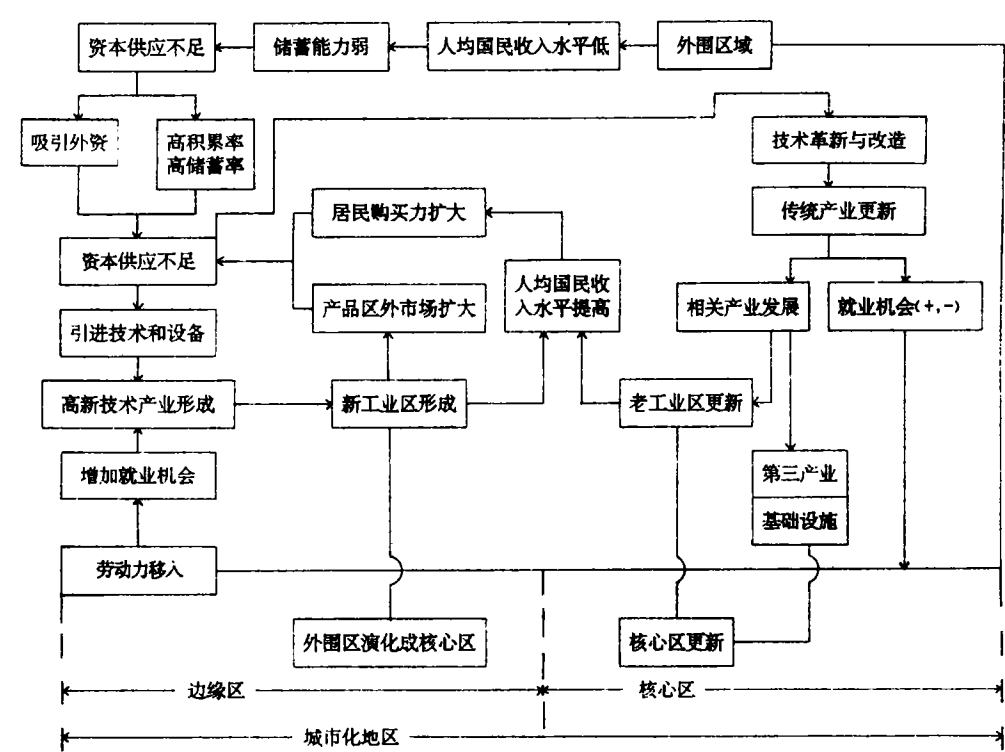


图 6 城市化地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良性循环系统

Fig. 6 Economic system for virtuous circles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性循环。在理想城市化地区，其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良性循环可按图 6 组织。

结 论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区域开发既按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施，又受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流动等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传统的“内陆均富”和“沿海先富”区域开发模式在经济活动国际化、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形势下，已经失去理论的支持和实证借鉴意义。中国区域开发新模式应该走以城市经济为主体、合理组织功能型相互依存性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之路，加快发展沿海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四大城市集聚区和内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地区，使之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都市区、大都市连绵区和世界都市带。

参 考 文 献

- 1 Aguinier P. Regional Disparities Since 1978. in Feuchtwang S, Hussain A. and Pairault T. (eds) (1985) Transforming China's Economy in the Eighties; the Urban Sector. 1985, 2: 93-106. Zed Books Ltd, London.
- 2 Lakshmanan T R. and Chang I H.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87, 11 (1): 97-103.
- 3 Lo Chor-Pang. The Geography of Rural Regional Inequality in Mainland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0 15 (4): 466-86.
- 4 Yang Dali.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0, 122 (2): 230-57.
- 5 胡序威. 试论我国空间发展战略. 生产力布局与国土规划, 1988, (7).
- 6 陆大道. 我国工业布局东西间宏观区位的变化. 生产力布局与国土规划, 1988, (7).
- 7 陈雯等. 中国经济地区差异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经济地理, 1993, 13: 16-21.
- 8 Falkenheim V C. 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gram; Some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Determinants, in Leung C K. and Chai C H. (eds).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 9 Naughton B.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1988. 115: 351-86.
- 10 Paine S. Spatial Aspec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ssues, Outcomes and Policies. 1949-79.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1, 17 (1): 132-95.
- 11 Selden 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 Y., Sharpe. 1988.
- 12 Solinger D. Uncertain Paternalism: Tensions in Recen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87, 11 (1): 23-43.
- 13 刘修文, 陈居奇. 试论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和出路.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89, (33): 1-12.
- 14 Lyons T P.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ies in China; Output and Consumption, 1952-198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1, 39 (1): 471-506.
- 15 Pairault T. Ide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1943-83, in Feuchtwang S., Hussain A. and Pairault T. (eds). Transforming China's Economy in the Eighties; the Urban Sector, 1985, 2: 26-50. Zed Books Ltd London.
- 16 田一农等. 论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 17 钟朋荣. 十年经济改革.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18 Jao J L. and Leung C K. (ed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ol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9 陆大道. 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 科学出版社, 1990.
- 20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0.
- 21 Knapp B.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ystematic Geography, London, 1986.
- 22 Friedmann J.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M. I. T. Press, Boston, 1966.

SYSTEMIC MECHANISM AND SPATIAL MODEL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Gu Chaoli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Beijing 100101)

Zhao Xiaob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can not be fully understood if its overall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in forms of fiscal budgetary power and economic planning,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between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 because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basically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lows of capital and resources in the economies, which are crucial source and dynamic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weaknesses in the Chinese socialist fiscal and planning systems and their resultant impact on China's spatial development before 1993. Based on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practices and reforms in the state financial and planning systems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interior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uneven coastal strategy" (or "getting rich first") have serious systemic flaws. In lin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Chinese real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for a better system or a model for Chines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which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play vital parts for more efficient and equitable spat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Flows of capital, Interior balanced development, Uneven coastal development